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抗拒遗忘】	文革的历史需要更多亲历者回忆	秦 晖
【往事非烟】	我的“恶毒攻击”罪	谢遐龄
【运动记愧】	抄家记，一个老红卫兵的自述	邬 飞
【书刊评论】	集中营的幸存者——《牛棚杂忆》英译版序	查建英
【史海钩沉】	我所知道的十四个中央专案组	吴法宪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抗拒遗忘】

文革的历史需要更多亲历者回忆
——在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的主题发言

· 秦 晖 ·

◇ 忏悔无法责于人，真相应该公诸世

这次年会主题为“回忆录 / 忏悔录 / 谈话录研究”，这个主题定得好。近年来，这“三录”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尤其是关于文革的“三录”。由于文革亲历者如今大都已经到了人生总结和走向谢幕之年，很多有话要说者都感到时不我待。而他们大都已经退休，既有了充分的时间，又少了工作时的种种顾虑和后顾之忧。同时他们还赶上了这个“自媒体”时代。文革十年对他们的人生和对这个国家影响又如此之大，事实上不可能被忘却。另一方面，除改革初期有过一阵“彻底否定”的热议外，1990年后这个话题很快又成为敏感领域乃至禁区，人们的记忆与反思已被尘封四分之一世纪，但所谓“不争论”并不能消除讨论之欲。文革一代有话要说，相对而言也有了说的条件，此时不说则此生休矣。而“后文革”的一代人也希望他们留下记忆。

于是近来，忏悔，尤其是与当年文革有关的忏悔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13年陈小鲁先生的忏悔，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好评。当然在今天这个多元社会不同的看法肯定是有。不过据我观察，反对陈小鲁忏悔的主要是对文革本身有不同评价的人。他们仍然认为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群众反官僚，或者支持“革命人民”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壮举，是好事，忏悔什么呀？就算有些“支流”错误，过去也点到为止了，现在又反复说，那些怀念文革的人就不高兴。还有些人倒不认为文革是好事，但认为事情都过去了，最好让人忘掉那一幕。总之，反对陈小鲁的人主要就是反对忏悔本身，而不是指责他忏悔得不够。

然而，2014年初宋彬彬女士等人的忏悔就有些不一样，不但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不满，一些文革受难者似乎更为不满，尤其是在宋彬彬等人风光之时被活活打死的宋的母校卞

仲耘校长的亲属，更是公开声明不接受宋的“道歉”，认为宋所谓“没有保护好”校长之说是在推卸责任，洗白自己。一时舆论纷纭，多数发言者似乎都不满意宋的道歉。有人指出宋在卞仲耘惨案前是上面扶植的校文革负责人之一，惨案后更受到领袖接见，名满天下，对学校这期间发生的事所应负的责任岂止是“没有保护好”而已。宋说惨案时她已无权，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人提出异议：工作组撤走后宋并没有被免职，学校里也没有出现另外的权力机构，而宋又恰是惨案后受毛泽东接见，声誉达于极点的，怎么可能此前已经失势？说是无政府状态，怎么只见一方任意施暴，另一方只能惨受劫难？还有人说，后来两派武斗时说是无政府状态，还有点道理，像这种只有一方镇压另一方的状态怎么说“无政府”？为什么就不是“政府”纵容的？或者是“政府”唱红脸、“小将”唱白脸的双簧？

显然，从这些异议中看到的与其说是人们对宋“忏悔不够”的不满，不如说是人们要求知道事实真相。事情已经过去48年了。如果说当时事涉敏感，现在一代人都早过去了，执政党公开宣布“彻底否定”文革也已经36年了，还敏感吗？发达国家一般都规定国务档案30年后应当解密，何况卞仲耘惨案虽说惨无人道人命关天，毕竟也只是一所中学里发生的一件具体的命案，远远够不上“国务”的层级吧。

如果说当事人还在就不好说，那就更没有道理。48年后当事人仍然健在的也已到暮年，正如陈小鲁等人所言，现在不说就没有机会了。特别是对于负面传言甚多而自以为事实并不如此的那些人而言，这时不给出一个言之成理的事实说明，人们能相信你没责任？这“黑锅”你卸得下来吗？要知道权势支配之下的罪恶，有权/得势者如要免责，他们是必须负举证责任的。百姓犯罪，刑事诉讼中要求诉方举证，你不能证明他有罪，他就应被当做无罪。而权力之下的集体罪恶，当权者本有责任阻止，不阻止就须负责，如果他自称阻止了但无效，或者自称被蒙蔽而不知情，那么他就必须为之举证。当初纳粹大屠杀之罪、日军南京大屠杀之罪，都是按这个原则进行的。诉方有力地举证了松井石根指挥下的日军确实杀人如麻，但是并没有举证松井亲自动手杀人，也没有举证松井具体下达杀人指令（如果有这种指令，当权者要销毁它也轻而易举，而后来的追究者要找出这种指令谈何容易），然而松井既不能证明他阻止无效，也不能证明他被蒙蔽不知情，他就必须为他指挥下的日军暴行负责。同理，文革惨案中的当权者不趁早举证，又如何能够卸责呢？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磨。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但是，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

例如，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真相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对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再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忏悔，就的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新生。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不追究战犯也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要求一般德国民众人人忏悔，在“人人都是罪人”这种貌似深刻的状态下真正希特勒式的罪犯就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也正因为这样，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才提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办法，即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自己的罪错要真心忏悔，而对于他人的罪错，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罪错，我们也许没法要求忏悔，有时也无权要求忏悔，但我们首先应该要求真相，也完全有权要求真相。

◇ 口述史料不等于历史，但留下史料才能还原历史

因此，我认为“三录”在今天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是通往“真相”的门径，而且是无法绕过的门径。

在史学界，“三录”与近几十年来方兴未艾的“口述史”关系很大。不过我本人对“口述史”这个提法有点保留。如今说的“口述史”，其实严格地说应该是“口述史料”。正如我们不能把传统的文字史料称为“文字史”一样。口述资料和文字资料都是历史研究的素材，没有这些资料研究就很难进行，因此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资料并不等于研究本身，文字史料如此，口述史料更是这样。进而言之，保存口述史料有几点是必须强调的：

第一，历史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一代一代人可以永远做下去。但口述史料却是及身而止，经历者一代人的生命过去以后口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很多人不愿做出口述，顾虑之一是去时未远，很多认识可能有局限。但其实认识可以无限深化，与后人可能的深刻相比，前人认识的“历史局限性”永远会存在。但记忆却是需要“抢救”的，也许等到你的认识足够“深刻”时，很多记忆可能已经丧失。所以反思永远不晚，但记忆必须趁早。有时有些事由于其意义未被回忆者认识到，可能会被遗漏。被遮蔽，那不要紧，以后认识到了还可以补充。现在能够想到的，就应该尽可能早地把它保留下来，以免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

第二，民族的记忆是由无数个人的记忆汇成的。因此“兼听则明”与“片面的深刻”存在着重要的辩证关系。尽管严肃的回忆者应该力求客观而避免偏见，应该有高超的史识史德和史才，应该尽可能保持全面而准确的记忆。可是这些都是“尽可能”而难以求全责备的。古今中外的回忆者作为芸芸众生，很难要求他们达到完全的客观，而“全面”就更难要求了。事实上，回忆者作为所回忆事件的参与者和经历者也很难做到“旁观者清”，完全摒除自己的情感和倾向性。因为实际上，对大多数并非研究者的回忆者而言，情感和倾向性正是促使他回忆的动力。很多回忆都是在“有话要说”的冲动下才有可能。一个人如果看破红尘，真的对往事冷静到心如古井，或者极度犬儒，麻木到心如死灰，他也就没有回忆的动力了。而如果谁都不提往事，那往事就真的“如烟”飘去，而无人提起了。“往事并不如烟”，就在于心有块垒，不吐不快。“块垒”既是动力也是局限，所以口述史料有“偏见”和误差是难免的。

尤其是经验表明，记忆的“全面”比“准确”更难达到。一个回忆者即使有足够的责任心和严肃性，他或许能够做到自己所回忆的都是真的，而没有任何编造、想当然和道听途说的成分，这已经是非常不易。但“回忆的都是真的东西”仍然不等于“真的东西都被回忆了”。在无数事实中他能够回忆出来的仍然只是“先见”所过滤出来的一部分，“选择性记忆”是任何人都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在一个文明的时代，口述史料的提供者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关键是后来的研究者要“兼听则明”。有偏见不要紧，关键是不能只允许一种偏见，更不能搞强权操控下“有组织的单向偏见”。这就是知识发生学上所谓的“片面的深刻”：尽管每个论者也许都难免“片面”，但是在自由的探讨中只要他们都足够深刻，在商榷中互相纠偏就可以共同推动人们总体认识的深入。有句老话叫做“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更可能的情况是“真相越辩越明”。涉及到价值观的推论往往永远是多元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

态会长久存在。但作为价值判断基础的事实判断确实更有可能通过多方的回忆比对分析来得到澄清。这就是我说的“从多元的记忆中趋近一元的真实”。有人说“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从绝对的意义上的确如此。但相对的“还原”，或者说对历史真相的“无限逼近”仍然是历史学家神圣的追求。而“兼听则明”是这种追求的基础。所以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口述史料”的研究尤其如此。

◇ 回忆是每个人的权利，不是永无错误的圣人才能拥有的特权

如上所述，历史回忆中单方面的真实可遇不可求，通常真实只能来自“兼听”后的分析。把回忆“真实”的门槛提得太高，以至于寄望一个德高望重的“绝对真实”者的权威回忆而排斥了其他声音，反而容易损害“真实”。

因此，在“真伪”与自由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去伪存真往往只能是对真真假假的各种说法进行分析的事后结果。如果一开始就以去伪存真为理由封住一部分人之口，你就很难得到真。倒是在人人都能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存心撒谎自欺欺人者、或信口开河不知慎言者就要小心：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经历过，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说话，同时代人都健在，谎话不难被戳穿。

换言之，我们必须明白：只有人人都能回忆，回忆者才会尽可能求准确，只准一个人回忆，哪怕这个人并非存心撒谎，甚至这个人确实自以为真实，也会因为在无须面对挑战的情况下缺乏谨慎核实的动力而错误百出。换言之，使回忆尽可能真实的最重要条件并非回忆者个人的史德修养（尽管这种修养很可贵，有之诚为社会之大幸），而是“回忆权”的普遍保障和对“言论管制权力”的严格制约。回忆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永无错误的圣人才能拥有的特权——这不仅事关言论自由，而且也是总体上提高口述史料质量的不二法门。

当然，“片面的深刻”要能进行有意义的商榷，而不是在吵架中徒增怨恨，互相理解是很重要的。笔者看到过不少对立的回忆者在回忆中发生的争辩，曾经对一个朋友做出如下建议：

1，对很多事情或褒或贬见仁见智，“价值判断”永远是多元的。但事情本身的真相只能有一个，“事实判断”有可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自己论述当然是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皆有，但进行商榷则主要应该讨论事实判断。您X老师如果是基督徒（只是“如果”，我并不知道他信仰什么），未必你们就不能讨论某件事情的有无了？所以这样的讨论还是就事论事的好，不必上纲上线把信仰什么的扯进来。

2，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别人的话错误，但是没必要也不应该揣度别人的说话动机并加以指责。诸如“居心叵测”之类的话不宜在商榷中出现。当然，在论证某种思想和观点的发生和流行机制时进行社会学分析，指出其适应了什么人的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这是完全可以的，但一般都是泛指。具体和某个人讨论时上来就指责其代表什么邪恶力量，这就是“大批判”，而不是讨论了。

3，往事过去40多年，每个人的回忆都难免出错——这也就是兼听则明的必要，指出错误用不着客气，但“造谣污蔑”之类的指斥是不宜使用的。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对动机的指责，而动机是没法实证的。这里尤其要指出，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有所谓“有错推定”的规则。在强势者有可能垄断证据的情况下，公众有怀疑之权，强势者有举证释疑之责，作为强势者你不能证明无错，那你就是有错。若能证明无错，你也不能加怀疑者以“造谣”之罪，因为弱势者是有权怀疑、无责举证的。当然，如今您与X老师都是老百姓，你们之间不

适用这种规则，他没有根据而提出一些关于您的不实之词，是不对的，你尽可以予以批驳。但是，1968年后的一段时间是强势的L派镇压弱势的S派，被镇压者X老师就当时的镇压指责镇压者，镇压者是要负无错举证之责的。同样，1983年处遗时您是被整的弱势者，您指责当时的处遗错误，处遗当局也要负无错举证责任。您与X老师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的诉说即便有过分、失真之处，强势者可以举证自辩，但“造谣污蔑”之类的罪名是不能加到你们头上的。这就如同在刑事案件中为了保护弱者的权利就需要允许抗辩和上诉。抗辩错误可以驳斥，上诉也可以驳回，但因抗辩、上诉而于原罪之上增加刑罚是不可以的。

总之，我们今天的反思是为了澄清事实，汲取教训，推动改革，避免覆辙，而不是为了冤冤相报。以上看法无论对您还是对X老师我都是坦率交流的。我也希望今后能继续从你们那里受到教益。

我觉得不仅对文革口述史料，对任何一段历史的口述史料以上的原则都是适用的。

□ 原载：《共识网》

~~~~~

### 【往事非烟】

#### 我的“恶毒攻击”罪

• 谢遐龄 •

采访者：干春松、曾亦、程乐松

干春松：据我所知，谢老师您早年在清华求学，学理工科出身。您家里兄弟三人后来都转入人文学科和思想领域研究，尤其是谢选骏先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自由撰稿人，还参加了《河殇》的撰稿工作。您兄弟三人在学科研究领域的兴趣转变是何时形成的？

谢遐龄：这个事情说来话可就长了。我籍贯温州。祖父先到上海。家父15岁从温州到上海。1952年从上海调到北京外贸部工作；翌年我们全家随迁北京。当时我国外贸的“客户”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恶化后，外贸部业务锐减，只好精减。兼之家母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家父要求回上海；那是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回不成，上海附近的苏州无锡也进不去，只有再远些的南通市还可进，于是举家迁徙到江苏省南通市。那年我正在高中三年级，独个留在北京准备考大学，所以与南通的缘份比两个弟弟要浅些。我是兄弟三人中的老大，谢选骏是小弟弟，老二叫谢松龄。

《河殇》第一稿是谢选骏独力完成的。谢选骏极富独创性。《河殇》中的主要思想我很熟悉，是我们三兄弟在家里读汤因比《历史研究》讨论时选骏头脑里冒出来的。那书是文革末期为批林批孔新华书店放出一批“禁书”时谢松龄陪他去抢购到的。

1966年6月，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好大学四年级，在北京郊区参加一期“四清”回校。那时候清华大学还是六年制。老二谢松龄还在读初中二年级，谢选骏念着小学五年级。这时文革开始了，他们就没有书念了。文革，正如毛主席说的，一批闯将出了名。我一不小心、糊里糊涂地就被打成“反革命”，成了“闯将”。就是“造反派”吧。开始气氛很恐怖啊。毛主席发话、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我们这些冤枉当了“反革命”的大学生平反，负面转为正面。于是理所当然为毛主席冲锋陷阵啦。那时候对弟弟们影响比较大，于是他们也参加当地造反派，在南通“造反”。后来，1968年，运动开始“收”了，我也被

抓起来了，南通很乱，谢松龄遵照父母意志，逼着谢选骏在家里念书，目的是关在家里不得外出，免得吃流弹。从那段时间开始，他们读了大量的书。

干春松：我想问一下，您以前参加的清华的造反派是哪个组织？

谢遐龄：井冈山，团派。

干春松：那您被抓起来，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收拢了，还是有别的原因？

谢遐龄：我是中间犯事了。1967年夏。

干春松：这个方便讲吗？

谢遐龄：这个当然方便讲了。全国政协增补我为委员的时候，那段历史在政协常委会上都公布过的。材料写得很清楚的。最初的结论，清华大学工宣队做的，给我两条罪名，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论是“实属敌我矛盾。经审查，谢基本上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是当时我“犯事”的“罪名”。平反结论是1978年3月做的，对原结论用的“推倒”一词。拖到8月，还等不到平反结论，没法儿录取，复旦哲学系请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打电报询问、索要，才寄达。

干春松：您怎么恶毒攻击的？

谢遐龄：唉，不少是很多人都在讲的，不算创见。比如“周总理跟林副主席不是一派”，这属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点儿自己见解的是指文化大革命一些现象是“宗教崇拜”——这属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运动既然是路线斗争，就有个站队问题；站队不就有派别了？当时毛主席就讲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开始审查我时还有个“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罪名，是我的“罪行”最主要的依据。作结论时林彪已死，罪名不减，理由是“你攻击时林副主席没出问题”，所以“你攻击的是党”。实际情况是：我说“‘揪军内一小撮’不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的，是林副主席提出的”，“唉，林副主席怎么会这么‘左’？太失策了！”这哪里是攻击？这是私下的评论，没有攻击的意思。后来中央文件讲，在清查“5·16”过程中揭发出大量的林彪乱军材料。这才明白隔离审查我们意图所在。

被放出来以后，我被派到部队农场继续改造。本来改造的期限是一年，但拖拖拉拉不断延期，大概当时有关部门顾不过来，最后搞成两年。

文革期间有个中央文件，很有名的，主题是“两个估计”：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认为解放以后十七年的教育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所有的大学生毕业了之后都要接受工人、农民、解放军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有的要到工厂里劳动，有的到农村劳动，像我们，则到解放军部队劳动。

干春松：好像认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谢遐龄：你说的是毛主席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布这条指示时，我已经在部队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住在河北省一个村里——莲花池村。半夜里集合，绕村里土路游行几圈欢呼、拥护。完整的说法是接受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的再教育。毛泽东的设计中也分成三个路子，其中有一些人直接分配到单位、分配到工厂里，还有零散下插到农村的，不像我们要专门集中起来再教育。而在集中起来再教育的这批人中，清华的毕业生则非常多，占了很大比重，因为当时清华校园里正在武斗。这也是个特殊的背景。

干春松：劳动结束以后，组织给您分配了什么工作呢？

谢遐龄：我的情况还跟别人不一样。其他人都分配工作了，我回学校继续接受审查。这是因为中间我搞了一个“翻案”，把我原来承认的一些东西推翻了。于是组织上认为我不老实。可实情是我之前被迫承认的事情很多不是事实，必须恢复真象。

干春松：您回到学校之后，被审查了多长时间呢？

谢遐龄：三年。在三年时间中，我参加劳动、接受审查，有一段时间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干春松：我读过孙月才先生编的《文革十年日记》，在他的介绍中，隔离审查的过程还挺罗嗦的，总是要没完没了地写各种材料。这个环节中组织肯定让您交待几件特定的事的，要是没有讲清楚，隔离审查不会结束。但是由谁来确定您是不是交待清楚了呢？清华当时有这样一个机构吗？

谢遐龄：有啊，专案组啊。专案组是一个大机构，给每一个人都设立了专案小组。专案小组成员少则一两人、多则三四人来负责你这个案子。

在审查和劳动都结束以后，给我分配了工作，让我回“原籍”了——回到家庭所在地江苏南通工作。但是给我身上带了这几个字：“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事实上还是认定我的问题就是“敌我矛盾”。

干春松：您回到南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呢？

谢遐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南通市好像已经不属于南通专区了，但还是县级市。南通专区原先有一市六县，那时南通市属于南通专区。当时南通专区由剩下的六县组成。南通市升级为地级市是后来的事。再若干年后南通专区取消，六县归并入南通市；南通市成为若干城区和几个县并存的格局。家父希望我分到南通市。他是“中央下放干部”，跟当时的地委组织部长常打交道，很熟，说得上话。虽然南通市不归专区管，但地委和专署都在南通市，专区还有几个大厂在南通市。组织部长说这几个厂都很需要人，到地委工作也行啊，留在南通市没问题。然而一收到调令，部长就没辙了。她告诉家父：清华指定，一定要放到最基层去锻炼。这是因为我在给结论签字时写下三条保留意见，表示不同意结论中给我加的罪名。工宣队认为我态度不够好，虽然没有扣留我、不予分配工作，但结论中没写我态度好——意思就是认罪态度不好。

我临离校时工宣队负责人把我叫去训话：“你要向邓小平学习，保证永不翻案。”我回答：“我不会翻案。是问题，想翻也翻不了；不是问题，到时候用不着我去翻。”那位工宣队员说：“哼，你就等着有个比清华工宣队水平还高的单位吧！”

于是，我不能到本来安排好的位于市区的南通机床厂了，只能下到县里去。可是到了县里以后，县委组织部告诉我，要我当中学教师。这下可把我们家里人吓坏了。报到前，亲友很有预见，反复跟我说，千万不能当教师；说那可太危险了。我还安慰他们说，组织给我认定的是敌我矛盾，阶级敌人啊！组织不可能派我当教师的。没想到，那个县委组织部没把这事看得很重，严肃地跟我讲：人民教师，很光荣嘛。我一想，我这敌我矛盾就这么人民了？还有寒暑假，那就去吧。就这样当了5年中学教师。

干春松：我在想您当时是教什么课程呢？因为后来您从事了哲学研究，您如果当时是教了五年语文或者政治课，这倒比较容易理解。

谢遐龄：我先是教了物理和英语，后来什么都教，除了政治课没有敢让我上，体育课、语文课、化学课、数学课，我都教过。不过挂名物理教师，正常的话我教物理、英语。其他教师忙不过来时还教化学、数学。反正就是除了政治课，我什么课都上过。

干春松：您教完五年中学后，考研究生也可以考很多地方，可是为什么却选择了复旦呢？

谢遐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想考到上海去。那时候家里很穷，1961年，我家就搬到了南通。我1962年考大学，当时想着能离家近一点好。家父是温州人，年轻的时候到上海工作，现在回到南通他也老大不愿意，所以他也希望我去上海。而考大学的时候，上海只有同济大学到北京招生，可我不愿意去同济学什么造公路。所以我只好“被迫”考清华了，第二志愿报的北大。我对北大的生物物理比较感兴趣，但是“不幸”地落到清华去了。当然，我本来是想考哲学的，但是害怕背历史。考哲学得背7本历史书，我害怕。考数理化却很轻松，所以选了理工科。填报的志愿除了第二志愿，全是工科。这是随了当时的流行观点：国家搞建设，工科最需要人。

干春松：您在审查期间、在教书期间对哲学的兴趣也未见减少。当时有阅读一些哲学书吗？

谢遐龄：我在大学期间被老师批评为不务正业。我很“不幸”，从我念大学那一年即1962年开始，开始给本科生设班主任。当我开始念研究生即1978年，又给研究生开始设辅导员。我是伴随我们党不断加强管理的过程而成长的（众笑）。两个加强管理的启动阶段，都给我赶上了。

大学期间，有一次，在考试期间，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被我们班主任抓住了。他问：“谢遐龄，你在干什么呢？”我说我散散步，他过来就翻我书包，当然是很亲切地“野蛮”了一下。结果发现我书包里只装着两本书。一本大概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到底什么书我记不准了，还有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许因为考试期间而没装与考试相关的书，他指着《物种起源》说：你怎么看这种书？意思是你不务正业、怎么看这种书？这个书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说法很实际，跟我专业没有关系的书好像不能看。我当时只好找了一个理由，说我看这个书是为了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后来这件事成为批判我的一条罪状：谢遐龄竟然说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助于学习马克思主义！

曾亦：您讲这个话也不算错。

谢遐龄：工科的老师思想没有像你这么“开阔”的！当时批判我的人给我安了很多罪状。比如，当时大家都要检讨自己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思想，很多人想尽办法的自我检讨。可我当时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根据辩证法，事物是相互转化的，贫下中农经过剥削可以变成地主富农，那么地主富农为什么不可能变成贫下中农呢？好了，这话可又是一条罪状：谢遐龄竟然说地主富农可能转化为贫下中农！你说那个时候多有意思。

干春松：那不是讲理的时代。

曾亦：您那时候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谢遐龄：说来惭愧，不如你们正宗。我开始接触哲学是毛泽东的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上高三时，我们的政治老师讲哲学课的时候有点儿思辨性，把各种句子组合来组合去，讲得人晕头转向的，就像俞吾金做的研究似的，喜欢把这个词翻过来翻过去地讲，相当好玩儿。那时觉得哲学好像嚼舌头，嚼来嚼去的，很有意思，就迷上了。

干春松：您当红卫兵或许就用得到这个本领，可以用来写大字报（众笑）。

谢遐龄：（笑）用不着。写大字报没有用这个写的。不过我倒是很会写大字报。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多半是政论文，长篇大论的。比北京大学的，无论量还是质，都高出很多。这可能因为高中时语文学得还可以，而后读读唐宋八大家，还读了不少鲁迅的杂文。我看鲁迅的文风跟八大家还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八大家的很多文章擅于分析。鲁迅自己说他抄了很多碑文、墓志铭。鲁迅比八大家要深刻，或者说尖刻，不知与他是绍兴人相关，还是因为当时斗争激烈不得不然。我深受鲁迅影响，风格非常独特，也都是小杂文，有点儿尖刻。多年以后才醒悟，转奉温柔敦厚之旨，但似乎还是磨不净鲁迅之风。

在此期间，我写过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就是分析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根源是刘少奇。我可能是最早批刘少奇的人。

曾亦：那是文革前？

谢遐龄：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刚刚从反革命翻身。写大字报的时间应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不久。因为我们都跟王光美结了仇，所以我们不能不跟刘少奇对立。

干春松：你跟王光美是怎么结仇的呢？

谢遐龄：她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啊！那时候清华工作组有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王光美是顾问。我们总流传她的一些轶事，比如我们都传说王光美进校园的时候是坐着一辆中吉普来的。吉普车把她带到清华附近，她才下车把自行车搬下来，再骑自行车进校园。这些故事文革期间谁都知道，我们只不过是说一说。然后在毛泽东下令撤走工作组之后，有一天中午，我到九饭厅去吃饭，去晚了，刚打完菜，就发现大食堂的后面本来站着很多人，可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走到打菜的地方来了。噢，原来是因为王光美站在打菜台口，给学生们打菜呢。我倒也不走，就故意在这儿站着，看看王光美怎么打菜？这时候，她把菜勺刚刚一放，学生们就在她穿围裙的时候围过来了，个个都带着谄笑，都候着，一个一个争着，希望王光美同志给自己打菜。她怎么打菜呢？就是大师傅打完了菜以后，她来给你添一小勺嘛！后来真正打菜的大师傅也看出来了，于是很自觉地少打一点，叫她添了菜以后跟原来的数量差不多。这个故事也是作为她当时的轶事广泛流传的，名字就叫“王光美同志还给你添一勺”。这我是亲眼目击的，距离就隔了不到一丈远。后来斗她的时候，我也“目击”了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在造反派里有点地位，号称是“造反派的理论家”了。斗王光美的时候，又是我们电机系的人在主持会场，于是乎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穿过层层岗哨走到最当中，走到她挨斗的现场参观了一下。

干春松：据说在她脖子上挂了一串乒乓球。

谢遐龄：对，就是模拟的项链，是挺侮辱她的。好像高跟鞋也这么挂着。

干春松：您是造反派，那么具体批判的人是你们安排的吗？

谢遐龄：那当然了，都是安排好的，一个一个上来的。但是我跟这个批王光美的活动没有关系，我只是去参观了一下。我比较“散仙”，之所以被他们叫为“理论家”，就是因为我写的文章大家都比较喜欢看。当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叫叶志江，他最近这些年写了很多回忆文章，不少地方提到我，但是失实的地方很多，他把我提得很“神”。其实远不是那样。

干春松：您虽然被称为“造反派的理论家”，但您应该不止是根据八大家和鲁迅的作品来变成理论家的。应该还读了不少列宁的书？

谢遐龄：我主要是喜欢思考问题。实际上，在1965年到1966年间搞了一期四清运动。我作为四清工作队员在乡下待了8个月的时间，狠下功夫读了一些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特别是读了很多毛泽东的著作——恰好那时林彪在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的分工是主管所在大队阶级成份审定，着重找找有没有漏划的地富等阶级敌人。我的思路是从理论出发，因而先查找文件、仔细地研究政策。却发现了毛泽东跟政务院有一些分歧。我也奇怪，怎么那个时候居然能读懂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干春松：这是一种政治敏感性？

谢遐龄：不是政治敏感吧。是书虫特性吧。就是读得多了，就发现问题了：在四清运动之前是中苏论战，清华和北大都是搞运动的试点。北京大学聂元梓跟校长陆平的分歧也就是在城市四清运动中结下的。文革初聂元梓才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跟前面的斗争是有关系的。所以那时候我不是学哲学，基本上属于学党史。

后来我被关起来了，也没有人给我送书，举目无亲。正好跟我关在一起的一个人他有两种书，一种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另一个就是毛选四卷。这两种书成为我的重要教材。我从毛选四卷的注释里，认识了我们党在抗日期间怎么保存实力、怎么发展力量、怎么积蓄了力量最后跟国民党对着干。这都是我自己在监狱里读毛选从注释里面学到的，不是后来人们教的。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研究共产党的性质，体会到帮会对历史的重要，体会到哲学的味道了。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会党、反对秘密结社，但是到了俄国则一定要搞秘密结社，一定要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我特别注意这些历史。所以我对列宁、斯大林的很多理论要了解得比别人多一些。

在监狱关押期间，清华发生了武斗。我居住的宿舍楼是武斗据点，我的宿舍在一楼，全部个人物品都丢失了。我藏的很多书都被别人拿走了，连棉被也没有了。我是有问题的人，因而连接受补助的资格也没有。因此只好在废书堆里面挑马列主义的书，挑了一大堆，还到旧书店买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买了很多套这类书，带到乡下去。

我被归入“有问题”的劳改对象。当时工宣队向党中央报告，说这些有问题的人基本上属于敌我矛盾，应该集中起来，跟“好人”一起去部队农场锻炼。我们在部队农场先是集中在一个连队中，另外一半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派。当时他们还是好人。清华的“反动”分子很杂，有文革前的“反动学生”，文革中的武斗分子，以及我这样的文革中的“思想犯”。武斗分子当时还自诩为英雄。但北师大的正面人士很看不起清华的反革命们，理所当然地常常与清华武斗分子发生口水阶级斗争。不足一个月，为便于管理和改造，把我们清华的打散分到四个连队。改革开放以后，北师大那批人士大部分成了“三种人”，我们大部分平反成了好人。真是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啊。

重分连队后，新连队一共14个班，两个清华班集中了有问题的人，其他12个班都是好人，来自北京师范学院——当然，后来在锻炼期间搞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挖出几个有问题的人，但比起我们，都属微不足道的问题。最后做结论时，问题班的清华同学大部分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仅有少数几个是敌我矛盾，与开始估计相悖。于是我铁定是敌我矛盾。

干春松：您属于“性质比较严重”。

谢遐龄：当时打倒我的时候，整个是轰动了北京城，甚至对外地也有一些影响——北京市贴了大量铅印告示“蒯大富们坐班房”，有照片有文字介绍，我的放在首位；京沪列车上贴着“打倒谢遐龄”的大标语。闹得动静非常大。这期间使我真成了一个“名人”。

先是团派抓了“414”的一个总部委员陈楚三，送进了公安局拘留。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康生的养子。“414”为了对等，要从团派找个与陈楚三在造反派组织中地位和影响差不多或更“高级”的人出来搞搞，正好我出事，就揪住了我。“414”一方面组织人员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静坐，要求释放陈楚三；一方面策划组织炮轰我，搞得声势浩大的。团派受到巨大压力，应对之策，领导层有了分歧。

1967年夏，毛主席讲“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了”。有民间观察家提醒我，毛主席要收拾造反派了。劝蒯大富很难开口。一次我稍微一提，蒯就正色说：“要绝对信任党中央、毛主席！”只好旁敲侧击、曲为之说。蒯稍稍收敛，被看作“右了”，激起鹰派对我强烈不满。我就逐渐淡出了。几个月之后出了事，鹰派认为我属于个人行为，又拖累了组织，不值得同情，主张把我抓起来送公安局。老蒯还够朋友。他们在隔壁打电话，向老蒯施加压力。蒯沉吟片刻，说：“让他回家吧。”

到底还是送了几次，但北京市公安局以证据不足始终不肯收。最后还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出面下令，市局才收下。谢富治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北京市委书记。给我作结论时，他还是好人。大概我不得不敌我矛盾，这是重要原因。

在劳动的过程中也有好多趣事。我记得，有一次我托人买了一本《资本论》第一卷，还被批判了。因为当时林彪有一句话，号召要用99%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意思是排斥学马列吧。我当时所在的那个班的班长是造反派，他说，林副主席说了，要99%的时间读毛选，你用这么多时间读马列，还有时间读毛选吗？我说：我以前读毛选的时间非常多，加上以前的时间就是99%。后来倒好，换了一个班长。新班长是高干子弟。虽然他的父母是国民党，但他的外公是共产党，他一直跟外公生活。他外公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共四老之一徐特立。他一当班长就宣布，学马列跟学毛主席著作是一样的，支持我们读马列。因为他一看我们读马列就认定是对毛泽东“革命路线”不满，是造反派中的“异类”，与早先被打下去的高干子弟读马列有共同倾向，所以他很支持。当然这些话他隐而不宣。因此，当我在部队的农场里面托人买《资本论》的时候，也引起了他们很多议论，很多人说我这个家伙坚持反动立场。

（下略）

□ 摘自“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思想革新运动”，标题为编者所加

~~~~~

【运动记愧】

抄家记，一个老红卫兵的自述

• 邬 飞 •

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我是科大力学系62级学生。8月中的一天，同学何乃普（已故）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红卫兵，顾名思义，红卫兵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我当然要参加了。这样我就成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一员了。

这个红卫兵组织绝不是自发的群众组织，它是有官方背景的。何乃普文革前是我年级的团支部书记，还是我年级稀有的几个共产党员之一。818那天，他也和宋彬彬一样，作为红卫兵的代表上了天安门城楼，得到毛主席的接见。

818过后某天凌晨，我在睡梦中被叫醒，说是“有行动”，就迷迷糊糊的跟随其它红卫兵，上了一个大客车（科大校车？）。车上有三十来人，主要是我系61，62级的红卫兵，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中学生，据说是科大子弟中学的红卫兵。在车上我得知，这次行动是去抄张治中亲戚的家，因为“枪嫌”。

汽车从玉泉路科大校园出发，约半小时后抵达王府井北边八面槽，我们下了车，轻手轻脚的走到一个普通民宅的门口。那时漆黑的夜色才开始离去，市民们还在熟睡中，住宅区毫无动静。红卫兵中的两个人徒手翻墙进去，从里边打开了院门，其它红卫兵鱼贯而入。我们先进了小院子的正房，房间不大，摆满了家具，还显得有些拥挤。房主没在这屋睡觉，想必这间房是个客厅。等了一会儿后我们被告知，院子里住有两对夫妻，都已被控制，搜查可以开始。

事到临头该动手了我觉得有些心理障碍。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是，别人的东西未经允许不能碰。既然这次行动是为了搜枪，保卫毛主席，我也只能说服自己开始行动，打开一个个的抽屉，见没有枪就关上。很快，我周围的抽屉都翻过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看周围其它红卫兵不仅是找枪，所有物件都要审查，还不时听到对一些物品的评价：“这块表是真金的吧”，“这里还有首饰呢，真够奢侈的”，“这个明信片上有外国字，房主一定是特务”。我感到不解，就问身边平常相熟的红卫兵，“咱们不是来找枪的吗？干嘛翻人家的私人用品？”那位红卫兵答曰：“谁知道呢？”从她的表情，说话声调看，她和我一样“不理解”。知道自己不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缺乏阶级感情”者，感觉好多了。于是把开过的抽屉再开几遍，关几遍。只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我在忙着就成了，抽屉里的东西我一样不动。

就在我实在装不下去的时候，看到几个红卫兵把光着上身的此房男主人拉到客厅来审讯，我就围了过去。这个房主是个中年人，个子不高，胖胖的，对于红卫兵问话，如“枪藏在什么地方？”，“你的特务联系人是谁？”基本不回答，眼光中透出敌意。当时的红卫兵已让毛泽东捧成了“大爷”，房主这样的态度红卫兵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和平审问就升级成了暴力逼供。几个红卫兵用皮带抽这位房主，房主却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动手打人的红卫兵主要是那几个中学生，我记得只有一个大学生，61级的XXX。看到这里，一个同伴悄声对我说，“走吧”，离开后立即互相表示了对XXX的鄙视。大部分红卫兵是不赞成暴力行为的，只是当暴徒手里拿着皮带的时候，没有勇气站出来制止，怕皮带落到自己头上，也怕被人说“站错立场”。

从客厅里出来就见一个不大的小院，中间点着一堆火，正在烧书。火旁，待烧的书已堆成山。我过去一看，有不少是钢琴谱：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我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知道国内出版的古典乐谱有限，大部分私人所藏乐谱都是外国出版，几经周折才到达中国，不

少乐谱是二战时期犹太人带到中国的。希特勒都不会对这些乐谱下毒手。而今天这些宝贵的东西就要被毛主席的红卫兵付之一炬，我好心疼，就禁不住坐在地下翻看，好在我还在“革命”队伍里倒也没有人阻拦我。

当时的任何一个红卫兵都有权把书从房主的屋内拿出来烧掉，不必征求其它红卫兵的意见，而任何一个红卫兵都无权从院子里把待烧的书拿回屋内。因为当时所有的文化差不多都被毛泽东说成是“四旧”、“封资修”、“毒草”，妨碍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红卫兵认为毁灭这些文化就是保卫毛主席，要读书就只能读“马恩列斯毛”的，其他一律该烧。

我在院子里翻阅乐谱的时候，听到院角落处一间偏房里传出一阵阵的响声，走过去看到红卫兵正在偏房里“掘地三尺”。偏房像是此院子另一对夫妻的住屋，屋内家具简朴，屋子又黑又小，仅有一进门处的空地又被这刚挖的大坑占据了。一个素装文弱的女人站在屋内，眼看着红卫兵在摧毁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家，脸上毫无表情，一副逆来顺受，无可作为的样子，叫人无法不同情。谁还能在这样的房子里睡觉？那么这可怜的女人今晚去哪里睡觉呢？人不睡觉又怎么能活下去呢？

抄家从早上4，5点钟进院门，直进行到午后，没有找到一支枪，却从小院里抢劫了满满一个平板三轮车的值钱的生活物资，房主受到鞭打，大量的宝贵书籍被焚烧，房子被破坏。院子里这两对夫妻的生活，从此会大不一样。谁得到了好处呢？毛泽东摧毁了旧的文化，才能使人民更加愚昧地跟着他发疯。“走资派”把矛头引向黑五类，才能暂缓被夺权的厄运。街道积极分子给小院的居民制造麻烦，逼他们出北京，才能把房子收归国有，归街道掌控。红卫兵是在表现他们对毛泽东的忠诚，比赛谁更革命。北京那时期这样的事情有千千万万。

就在抄家的两天之后，我听妹妹说，他们学校（女十二中）的一个女教师自杀了，她是张治中的亲戚。我马上就想到了抄家时见到的文弱女人，我心里顿时一惊，问我妹妹那位教师为什么自杀，是不是在学校挨整了，妹妹说，这位教师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在学校挨过整，自杀原因不知道。女十二中，我们去过的小院，基督教青年会，都近在咫尺，她的自杀毫无疑问与我们抄家造成的伤害脱不开干系。一个无辜、善良的女人就这么走了，该负一定责任的红卫兵却毫无所知。那位通知我们去抄家的派出所的人应该是知道的，可是上边没有要追究一个人死亡原因的政策，真是草菅人命呀！虽然刘少奇死了当时也没人追究，可他毕竟是自愿加入政治角斗场的，他在得意的时候整起别人来也是毫不手软。这位文弱的女教师凭什么就成了统治集团内讧的牺牲品？

在这次抄家之后，我们这些红卫兵又去抄过两次家，都是在东城区八面槽一带，后两次的行动只看到人去楼空，原住户已被“扫地出门”了。

每个人的一生在关键的时候，都面临选择，选错了就得承担责任。政府没有追究我们，可是我们得面对自己的良心。当初我选择追随毛泽东，参加了破坏法治、残害守法公民的抄家活动是完全错误的。这些行为与法西斯份子、恐怖份子没有两样！我们真正应该保卫的是法律，是社会秩序，保证弱者与强者和平共存。对统治者的愚忠，就是文化革命能够在中国发生的基础。现在统治者已不提阶级斗争了，因为他们已成了最富有的阶级。他们现在打的是“爱国主义”大旗，打压本国公民。衷心希望年轻人自重，不要去充当专制者镇压人民的工具。

□ 作者投稿

~~~~~

## 【书刊评论】

### 集中营的幸存者——《牛棚杂忆》英译版序

• 查建英 •

虽然距离“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终结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然而在中国，考虑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力和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它依然被当做敏感的话题束之高阁，少有人触及。而官方的历史资料则被封存，不对公众开放。关于文革的学术类书籍，不管是比较历史视角的，或是事件深度分析，再或是系统详实的个人回忆录，都凤毛麟角。首次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的、季羡林所著《牛棚杂忆》，则是文革回忆录中的翘楚。

书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牛棚”——一种文革时期的产物，在当时非常普遍，全国各大城市均有使用，用来作为各种“坏分子”、“反革命”等等“犯人”的临时关押中心。而季羡林的“牛棚”，被设置在北京大学校园的中心，季羡林与其他被“打倒”的教授、校领导一起，被关押在此处长达九个月时间，他们在牛棚里进行劳动改造，学习毛泽东语录。“牛棚”弥漫着地狱一般的恐怖气息，红卫兵每日必行的、带有施虐快感的、种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身心折磨，饥饿，人性的退化——所有种种都被生动的描绘刻画出来。的确，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回忆录中，我找不出另外一本书像《牛棚杂忆》一样，提供了如此直观的、详实的、满目疮痍的证词，充分地展现了文革时期在中国被关押的知识分子阶层遭到的身心折辱。在阅罢这本书之后，我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朋友向我总结道：“这是我们的奥斯威辛。”

（译注：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时期建立最主要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距克拉科夫西南60公里的小城奥斯威辛。该集中营于1940年4月始建。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万湖会议通过“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约有110万人在此被杀害，超过九成遇害人都都是犹太人。）

在精神上从种种黑暗回忆中解脱出来，并且用如此平和的、流畅的、真实的口吻记录下残酷的历史事件，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或许并不容易：季羡林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已经超过八十高龄了。在开篇中，季羡林坦诚的写道，他已经徒劳地等待了几十年，等待有人挺身而出书写这样一本见证性的回忆录。而最终，受困于老一代人的集体失声，和年轻一代人对文革的茫然无知，他决定亲自动笔来写这样一本书。

《牛棚杂忆》一书，于1998年在北京由一家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译注：时至今日，大多数文革类的书籍还是通过香港出版，或者作者购买书号自行出版，或者私自印刷出版），当时国内正好处于一个政治氛围比较宽松的时代，而这本书的顺利出版也可能是得益于作者在中国学术界超然的权威地位。季羡林是中国著名的印度学专家，散文家，评论家，也是一位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爱国学者。因为他亲切、慈祥、老祖父一般的言行举止，季羡林在迈入古稀之年之后，逐渐成为了公众心中备受尊敬的长辈形象之一，同时亦深受媒体喜爱。这本书也十分畅销，几经再版。不过，当局也悄悄地采取了行动限制了有关该回忆录的公众讨论，因为它的主题依然被视为敏感的。而我们现在看到这本由江晨欣翻译的、十分优秀的英文版《牛棚杂忆》，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也为文革回忆领域添砖加瓦。它为了增进我们对文革时期的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读《牛棚杂忆》，也再度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些旧的问题和困惑。我们究竟能为某种奇怪的、冗重的现象——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多少合理性呢？而在今天，我们又真的能够克服种种不便，诸如资料有限，历史记忆消亡，顽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等等，来进行一场关于文革的、真诚的、有意义的、有启发性的对话吗？我存疑。在中国，围绕着季

姜林的这本回忆录的微妙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既展现了该事件的混乱性、复杂性又体现了历史见证本身岌岌可危的状态。

与其他普通的中国民众一样，在1966年毛泽东刚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季羡林并不知道这一事件会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季羡林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的贫农家庭，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奖学金的资助，季羡林在民国时代接受了完整的、系统的、国际性的高等教育。季羡林曾经在德国留学十年，学习了梵文和其他语言，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国任教于国内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并且很快升任了东方语言系主任。因为季羡林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因此他让自己置身政治——一个他毫不感兴趣的领域——之外。然而，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像大多数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季羡林看到了一份关于建设更强大的民族和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

然而，“做一个政治上的逍遥派”的想法，很快变成了奢望。在中国共产党的规程领导之下，群众动员和政治运动变成了一种国族性的日常生活方式，没有人能够躲在一旁看热闹而不参与其中，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毛泽东周期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最受重视的目标群体。季羡林对于过去在政治上的“消极”感到愧疚，于是他积极主动的“改造”自己。他于195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积极的参与各种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特质：思想整合以及对异见的不容忍。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超过50万的知识分子遭受无端控诉和迫害，哪怕他们的批评十分温和，哪怕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季羡林能够侥幸地在反右运动中置身事外可能归因于以下两点：其一是他的贫农出身，其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对党的政治路线提出异议，或与组织“分庭抗礼”。

实际上，季羡林能够成功“置身事外”也仅仅是文革第一年的事。文革中北京大学迅速的变成了各个帮派互相殴斗的角斗场，各种疯狂的大字报、批斗标语肆无忌惮地攻击着大学里的教授和校领导们，他们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季羡林对疯狂的一切感到困惑，他一言不发，试图隐藏在狂热的人群之中。但是季羡林身上也有一个致命弱点：他痛恨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干部，聂是当时北大校园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红卫兵帮派的领导人。虽然在中国，每一个派别都号称忠于毛主席，聂元梓却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在文革中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来攻击北京大学的某些校领导，并且获得了毛泽东的个人支持。季羡林对她恃强凌弱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决定——在一个一反常态的鲁莽时刻——加入她的反对者的阵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聂的追随者们立刻开始对季羡林实施报复：他们在一个夜里突然袭击抄了季羡林的家，不但砸碎了季羡林的家具，而且不可避免地“挖掘出”了一些可笑的证据，证明季羡林是一个隐藏的反革命分子。

正是从那一刻开始，季羡林的生活一下子坠入了地狱。接下来的章节是全书中最令人震惊和不忍卒读的。充斥着诸多痛苦的、难以忘怀的小插曲。不堪折辱的季羡林小心翼翼地准备了他的自杀，然而在实行的最后一刻被敲门声所制止。将近六十岁的季羡林，和其他的受害者一起，被野蛮地鞭笞、被吐口水、被折磨，尖刻又痛苦的呼叫声长鸣不绝于耳。他遭遇了前同事和学生的双重背叛。以下是在劳改营里的一个痛苦的场景：在持续不断的批斗会的压力下，季羡林的身体崩溃了，他的睾丸变得肿胀，以至于他无法站起来，也无法合拢自己的双腿。但是看守还是强迫他继续体力劳动，于是他爬了一整天来搬砖。最后他终于得到许可，可以就近去看看军医，他不得不在路上爬了两个小时才到达诊所，然而，在医生得知他是一个“坏分子”之后却拒绝为他诊治。他不得不又爬回了劳改营。

《牛棚杂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被羞耻感和罪恶感贯穿的写作主题。在关于毛主义分子的迫害的回忆录中，作者们往往把自己塑造成或者无助且无辜的受害者，或者（只是偶尔地），坚贞不屈的对抗者。然而在季羡林的回忆录中，这些典型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他

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改造运动中如何积极热切的参与配合，以及在压力下，他们如何频繁地彼此攻击。他嘲笑自己的“乌合之众行为倾向”，并且承认，直到他自己“倒台”的那一刻，他还在迫害其他人：既然我们被要求反对右派，我们做到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知识分子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都轮流地迫害对方。这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到来，而在我看来，这个运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导。

季羨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怎样参与的呢？“我还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然而我已经加入了迫害者的阵营。”对于季羨林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被宽恕的罪孽，因为如果说他和其他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彼此迫害感到愧疚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们已经被洗脑，从而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感到深度的罪恶和愧疚。季羨林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洗脑”过程是如何通过狂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种独特的毛主义思想改造手段——来实现的。而季羨林自己的意识形态转变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仪式来完成的。

震撼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早期的辉煌成就，季羨林对于自己不够爱国，不够无私，不够“要求进步”而感到十分惭愧：在共产党人与日本侵略者八年艰苦抗战的时候，他非常自私地前往德国求学，专注于个人的学术成就；他十分错误地试图规避政治，并且把所有的政治视为肮脏不堪的游戏，因为共产主义政治是完美的、理想的、神圣的。只有数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之后，他才能通过群众集体的考验，作为“人民”中的一员被接受。

季羨林把这种排山倒海式的罪恶感描述为“几乎是基督徒式的”，这种罪恶感又引发了一种羞愧感，以及一种强烈的、对于新的上帝——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的追随和崇拜的诉求。之后，就像一位侥幸获得证明自我价值机会的罪人那样，他急切地抛弃了之前所有的疑虑——标志着他仅存的批判性精神——然后变成了一名狂热分子。他积极投身到个人崇拜的新浪潮中去，同其他人一起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上百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丢弃了他们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对于季羨林来说，这种罪恶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被关到牛棚之后，他还在绞尽脑汁地反省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质疑党或者整个政治系统。

季羨林显然不是一只精明的政治动物或者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他承认在文革结束之后，自己才真正的“睁开”双眼看清真相，他并没有分析宏大的政治图景，或者解释造成动乱的始作俑者们的动机。但是他清楚的感知到了他的祖国在经历了这样一场重大的灾难之后并没有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在回忆录的最后，他写道：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译注：以上两段选自《牛棚杂忆》汉语版原文。）

季羨林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是暗指政府对于这一话题的任何深入探讨的封口令，而这一举措到今天依然还有实效。首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所有人都知道，毛泽东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在众所周知的历史数据中，我们可以盘点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背后的诸多复杂因素：在大跃进带来的、导致约三千万到四千万人民饿死的大饥荒之后，高级领导层之中弥漫的微妙张力；毛个人对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的渴望以及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粉碎任何可能被察觉到的、对其个人权力的挑战；他的激进的，日益趋向于疯狂的持续革命理论；他那深入骨髓的反智主义倾向以及偏执的嫉妒心。然而，从党的立场出发，允许对毛泽东同志的行为进行全面的深入调查和曝光会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如果“伟大舵手”的假面被揭穿，那么整艘船可能会跟着沉没。毛泽东作为一个象征，其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



再有就是人民大众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棘手问题。在所有激进组织中，红卫兵仅仅是最出名的成员而已。在全民疯狂的巅峰时刻，数百万的普通中国人参与了不同形式的违法活动，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暴力行为。据估计，在文革中自杀的、被折磨致死的、被政治处决的、或者在武斗之中被杀害的死亡人数总计成百上千万。这就使得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可能的。

因此，对于现状的处理方式呈现出了“愤世嫉俗的”和“务实的”二元对立色彩：在逮捕和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极左“四人帮”之后，政府正式地把文革定性为“十年灾难”，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允许有限地公众批评讨论，然后开始进入控制言论的阶段。这正是通过内部控制进行的无声禁令之一；调查、讨论和公众出版被大面积地禁止、压制或者边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文革的话题逐渐地消失了，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地相当自然。

而这种情况，对于那些遭遇了无数暴行伤害的人们来说，尤其不能令人满意且显得不公平。大多数曾经被红卫兵学生暴打的教师们，在文革结束后没有得到任何道歉。大多数像季羨林一样被关押在无数牛棚中备受折磨的学者们，还和他们当年的施暴者们一起工作、生活。这些施暴者们中，有一些甚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崭露头角，建立了成功的事业和生活。

季羨林本人十分担心“踩到他人痛脚”。因此在1988年完成《牛棚杂忆》的初稿之后，他将其束之高阁好几年，很担心它会被当做个人恩怨的报复。然后，他对初稿进行了大修大改，让行文风格趋于平和，并且隐去了大部分施暴者的真实姓名。季羨林说，他并不想要复仇，他只是想真实地记录一份历史文献，好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知道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并且不让悲剧再度上演。他为了在早期版本中没有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而表示抱歉。不过，读者们还是可以在讲述者的行文之中发现一些讽刺、挖苦和自嘲的痕迹。

最开始，我认为季羨林充满讽刺和自嘲的描述口吻是相当奇怪和令人费解的，直到某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中文写作或谈话过程中，这并不是一个不常见的修辞手法：为了控制暴怒的情绪或者转移难以忍受的痛苦，人们往往转向黑色幽默或者讽刺夸张。一位曾经在文革中参与公众批斗会并且被折磨和戏弄的小学教师对我说，那种对于身心的暴力折磨是如此的不堪，以至于像是被轮奸。在此后的很多年，他都会做关于当时的噩梦。后来，他的一位朋友发现，他在提及此事的时候，无论何时都用上了一种诙谐的口吻。“我自己并没有太注意口吻的转变”，他告诉我，“我想我把那段经历当成了一个笑话，因为我无法忍受直面那种痛苦和羞辱。”

作为文革幸存者，季羨林似乎也备受羞耻感的困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学者和作家通过自杀的方式来避免受到折磨，季羨林也反复提到对于自杀失败的矛盾心理。这是关于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荣誉感与自我修养的重要因素。在《牛棚杂忆》中，季羨林回忆起在文革结束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中共高级官员周扬时的场景。周扬在文革前曾经监督迫害了无数知识分子，直到他自己也成为被迫害的一员。周扬对季羨林说的第一句话是：“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但是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不但可杀，同时也可辱。”说罢，周扬放声大笑，但是季羨林知道，这是一个苦涩无奈的笑。

季羨林先生于2009年去世。在他逝世两年之后，一位北京大学的女性校友、同时亦是季羨林的旧友，张曼菱女士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了他们的友谊，并且做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启示。1980年代末，在学生们开始在广场上抗议的时候，季羨林和其他几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决定通过亲临现场看望学生们来向公众表示他们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支持。季羨林是其中年纪最大、也是最有名气的教授，他高调而来：他坐在一辆三轮车的平板上，车身上绑

着一条白色长条幅，上书“国家一级教授季羨林”，然后七十八岁高龄的季羨林被一位学生从北大西校园拉着穿越了整个市区。当他们最终抵达广场的时候，学生们爆发出了高兴的欢呼声。

在那次事件之后，每每教职员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强迫表态（宣布个人政治立场），季羨林总是说：“不要来问我，否则我只会说那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然后有一天，季羨林离开了他在北大校园里的住处，叫了一辆出租车，要求出租车司机带他到公安局。“我是北京大学的季羨林教授，”季羨林对公安局的警察说，“在事件期间我曾经两次前往广场声援学生，是我煽动学生闹事，请把我和学生们关在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也不想再活了。”公安局的警察同志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大学的行政人员，北大来人匆匆赶到，强制性的把季羨林“请”回了北大校园。

广场事件，在中国悠久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又一次的，高压政治下的恐怖悲剧时刻。然而这一次，独自披挂上阵的季羨林活出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荣耀与风骨。

□ 译自查建英为季羨林《牛棚杂忆》英译版写的引言，该书由江晨欣翻译，由 New York Review Books 出版。

~~~~~

【史海钩沉】

我所知道的十四个中央专案组

• 吴法宪 •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据林彪“四大金刚”之一吴法宪在临终前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一书中披露，“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吴法宪）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吴法宪在书中还特别指出，“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还下设了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一、刘少奇专案组；二、王光美专案组；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名叛徒”专案组；四、陶铸专案组；五、陆定一专案组；六、张闻天专案组；七、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我，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一、彭德怀专案组；二、贺龙专案组；三、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一、“五一六”专案组；二、抓叛徒专案组；三、叶向真专案组；四、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等人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主管彭真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专案的是江青。又如中央专案组“二办”里，主管彭德怀专案的是黄永胜；主管贺龙专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专案的是江青。中央专案组“三办”里的各个专案，主管都是谢富治。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据我所知，从我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起，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捕时为止，这一段时间内，除了刘少奇以外，中央再也没有正式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整个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关于几个专案组我还记得几件事情，在这里说一说。

第一件事情，关于刘少奇被定案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然后，凭着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最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来，就据此“证据”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案，“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

第二、关于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整理出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报告送上来以后，黄永胜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同意。”

这些年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报刊和书籍上说，黄永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的“同意”两个字，是他“残酷迫害彭德怀的一个铁证”，是他的一个“反革命罪行”。而黄永胜一直只承认，当时他只是同意上报党中央。

关于当时的这个报告还在，我已经找到了。节录部分如下：

时间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

此报告的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

黄永胜的批示：“同意”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

按照我们当时的作法和理解，黄永胜当时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中央。

由于黄永胜已经去世，我不得不在这里替他说几句话。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第三、关于为罗瑞卿做手术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罗瑞卿因腿伤的问题，住到解放军总医院——三〇一医院。由于伤口长期不愈合，几次做手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本人要求截肢。之后，总医院组织有关专家会诊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也建议为罗瑞卿做截肢手术。这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后请示林彪，林彪回复：“到秋天以后再动手术为好。”他的考虑是，八月上、中旬天气太热，伤口很容易感染，而截肢是个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出问题不好。再一个就是罗瑞卿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要抓紧时间搞一点材料。于是，专案组根据林彪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罗瑞卿的手术推迟到秋凉以后再进行。这个报告上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研究通过。

以后给罗瑞卿做的截肢手术很成功。关于这次手术，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总院副院长曹根慧主持罗瑞卿大将的截肢手术，手术医生是骨科副主任党光博和主治军医王一德、麻醉科主治军医宋运琴、手术室护士张晓媛。外科主任陆唯善到场指导。整个手术进行顺利。当时罗瑞卿平躺在手术台上，头对着门，脚对着窗户，陆唯善主任从侧门进入手术室，一直站在手术台边，视察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手术做得不错，手术以后恢复良好。但是因为股骨头已经坏死，所以截肢以后又进行了切除股骨的手术。当时的病例至今都保存着。”我认为这个描述基本属实。但不知为什么，三〇一医院给罗瑞卿做手术的几个医生，“九一三事件”以后也都被捕了。我认为，他们为罗瑞卿做手术是认真负责的，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罗瑞卿专案组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材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搞的。一次，专门从海军调来负责罗瑞卿专案的张晓山对我说：“对罗瑞卿确实搞不出什么材料，东拼西凑的还是不行。”

一九五九年以前，罗瑞卿一直任公安部长，在这期间他曾搞过几次反侦察工作。专案组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就把这些也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次驻厦门一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跑到了台湾，并在那边升了官。罗瑞卿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向台湾发了一个假情报，说那个人是假投降，结果台湾就把我们跑过去的那个师长抓起来枪毙了。还有一次，当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怕台湾潜伏大陆的特务搞刺杀行动，于是就要浙江省公安厅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发报给台湾，说毛泽东已经到了杭州，问怎么办。台湾方面立即回电说，应当怎样怎样。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很快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些都是我们反侦察的工作，当然不能算作罗瑞卿的“罪行”，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因此，一直到我被捕以前，对罗瑞卿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作什么结论。

第四、关于陆定一的专案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妻子严慰冰引起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约陆定一谈话，拿出一叠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写给林彪的匿名信照片，公安部进行了调查，核对了许多人的笔迹，确认这是他妻子严慰冰写的。彭真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给他写匿名信，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另外，这许多匿名信的署名都是王光美，发信的地址也是用王光美母亲所办的托儿所地址，这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的方式发的，这等于是公开的传单。

过了几天，彭真又告诉陆定一：“关于严慰冰的问题，中央常委讨论过了，认为严慰冰是个危险分子，中央常委决定要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里去。严慰冰的案子由中央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显然，是他们委托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陆定一的。为了避嫌，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工作。四月，中央专案组要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以约严慰冰谈话为名，将严慰冰带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到怀仁堂前，要她坐上一辆黑色的“吉姆”车里，一直送到了炮局胡同一号看守所里予以关押。一九六七年初，又将她送进了秦城监狱。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说：“叶群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了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林彪见了这些匿名信非常生气，为此专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向中央写了一个证明：“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的时候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里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因为严慰冰的问题而受到株连，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了软禁。一九六八年，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咎。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亲自召集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

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较大，应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 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